

习近平国际传播观的科学内涵、 核心内容与时代特征

周宇豪 刘 宁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交往的思想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交往和国际传播活动提供了独特的思维视域。习近平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世界交往思想为指导,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一带一路”建设为思想内核,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具有强大传播力和影响力的国际传媒集团为主要目标,立足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关键节点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传播实践,将不同国家和不同文明间的交往、交流关系以及交往、交流形式置于促进人类整体文明发展的广泛视域中,形成了特征鲜明、内容丰富完整的国际传播观。

关键词:习近平;国际传播观;话语体系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443(2022)06-0005-12

项目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18ZDA315);2022年度上海高校智库内涵建设项目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全球化现象的深刻剖析中形成了内容丰富的世界交往思想,为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认识世界以及怎样与世界交往提供了独特的思维视域,积淀了独有的思维特质。国际传播是国与国之间“民相亲”“心相通”的重要路径和渠道,是世界交往的基石和载体。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历代中国领导人和领导集体坚持以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交往思想为指导,不断根据变化的国情和世情实时调整中国对外交往和国际传播活动,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观。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历史性伟大成就,伴随着中国与世界交往更加深入,中国特色国际传播事业也在发生历史性转型。

一、习近平国际传播观的科学内涵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交往思想认为,生产力作用的发挥及其发展外在地体现于世界交往形式,只有在保持世界不断交往的格局中,人类文明才能从整体上不断向更高层次发展。“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1]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实质及其内在根本规律就在于“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1]。同时,马克思对同时代处于世界东方的大清帝国的闭关锁国政策给予了尖锐的批判:“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的帝国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1]习近平国际传播观在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世界交往思想的基础上,结合当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现状,创造性地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一带一路”建设思想运用于新时代中国对外交往和国际传播的实践,就如何营造良好国际环境,为国内改革向纵深方向发展以及让世界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发展价值趋向和路径选择做出探索,从而向世人展示作为“醒狮”的负

责任大国、富有活力开放大国和文化底蕴深厚的文明大国形象,做出了系列具有全局性、前瞻性和战略性的重要讲话、指示、批示及谈话,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契合时代发展需求,指导当代中国对外交往活动和国际传播工作的理念。

习近平国际传播观着眼于人类文明整体发展,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一带一路”建设为内核,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具有强大传播力和影响力的国际传媒集团为主要目标,立足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关键节点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传播实践,将不同国家和不同文明间的交往、交流关系以及交往、交流形式置于促进人类整体文明发展的广泛视域中,从根本上回应了“这个世界怎么了,如何认识和建设这个世界”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突显以当今世界共同关注的,涉及人类整体命运向何处去这个核心问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首先,习近平国际传播观创造性地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传播实践进行理论升华,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世界交往的思想体系和内容,开辟了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国际传播观的新境界;其次,习近平国际传播观在实践上运用马克思、恩格斯世界交往思想,对冷战后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变迁趋势以及全球治理体系和人类文明整体发展方向进行精准审视和判断,其出发点在于反映国际社会对人类命运整体走向的关切以及对建立公正合理国际秩序的期待,“让中国成为国际秩序的塑造者,从一个跟随时代的奔跑者转变为具有创新力的引领者”^[2]。

从国内发展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看,习近平国际传播观深刻回答了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伟大”需要什么样的外部环境、怎样营造这样的外部环境的重大问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外交往理论与时俱进的旺盛生命力。从客观上讲,新时代中国所面临国际舆论环境的复杂性、多元性和易变性为新中国建国以来罕见。一方面,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人民对中国重新崛起普遍持正面积极的欢迎态度,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实践为许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有益启发;另一方面中国的重新崛起被西方顽固反华势力认为将会从根本上动摇自工业革命400多年来由西方主导的对全球的绝对控制和霸权地位,而且在他们看来这种动摇不可避免地导致中西方之间的激烈冲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习近平顺时应势提出了新时代中国对外交往和国际传播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目标任务和实现路径,形成了具有浓郁时代气息和鲜明民族风格、中国气派的国际传播观,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世界交往和国际传播的思想理论。

二、习近平国际传播观的核心内容

习近平国际传播观的核心内容以“中国梦”为主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为红线,以改革创新全球治理体系和建设“一带一路”为抓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传播话语共同体,向国际社会全面阐述中国自近代以来的道路选择、发展过程和目标,生动对外描述中国作为“醒狮”的社会主义大国、负责任的大国、文化底蕴丰厚的东方文明大国的国家形象,让全世界清晰明确地听到中国声音,认识一个立体多彩的中国,用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理论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主张传播到全世界。

(一) 强化坚守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性

1. 习近平国际传播观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为指导

从整个意识形态理论发展史看,特拉西和黑格尔可以被认为是意识形态理论的创建者。根据齐格蒙·鲍曼的介绍,特拉西突出了意识形态作为理念的形成过程,认为意识形态表达了一种“思想的科学”或“观念学”,是一切经验科学的基础和真正的“第一科学”。^[3]黑格尔对意识形态的理解继承了德国理性主义的传统,认为意识形态就是精神现象学。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是马克思、恩格

斯运用唯物史观对以往意识形态理论进行扬弃而形成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意识形态与人们的利益诉求密不可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根本区别在于资产阶级否认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及由这种阶级性所导致的人们不同的利益诉求,即否认意识形态的特殊性;无产阶级主张意识形态在内容上反映一定阶级或集团利益,具有一定特殊性,但在形式上体现的是全社会的共同利益,具有普遍性。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意识形态反映一定社会集团的价值观体系。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的地位的新的统治阶级,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他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1]

习近平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强调在信息技术飞跃发展背景下,必须强化互联网思维,以互联网思维坚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底线。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国际传播工作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导权。在国际传播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并非意味着重新走回过去过度关注意识形态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的老路子。恰恰相反,国际传播作为国家利益诉求的呈现,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根本上反映国家利益和国家发展目标。国家利益一直是近代以来国与国之间关系发展变迁的重要支柱,对于中国当然也不例外。基辛格以其所信奉的标准美国价值观说道:“与美国打交道的国家需要懂得,美国对事物的判断永远不可能与美国对民主制度的看法分开。有些事件必然会引起美国的反应,即使会损害总体关系也在所不惜。”^[4]作为以美国为代表西方价值观坚定不移的捍卫者和传道者以及影响当代国际关系变化的重要参与者和具有战略思维的观察者,基辛格从本质上点明了意识形态在当代国际格局塑造和国际关系变迁中所处的核心地位。

2.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是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传播工作新局面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将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下的国际传播事业与西方资产阶级以“西方中心论”为核心的国际传播观划清了界限。“意识形态”属性始终是新闻媒体和近代以来国际舆论场话语权之争的第一属性。其中,“阶级性”是这一根本属性的本质体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世界交往的思想与西方资产阶级国际传播思想的本质区别就在于,敢不敢于正视媒体和国际舆论的阶级性这一根本属性。近年来,在信息技术推动下,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更加隐蔽,斗争手段更加多样,内容也更加复杂多变。不仅美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中国进行不择手段的打压和围堵,而且以美国马首是瞻的部分西方国家也围绕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当美国的“马前卒”。

我国在国际传播一线的工作人员曾撰文介绍西方某些媒体精英——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刊文认为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由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推进现代化进程令西方不解。^[5]这种不解伴随着中国进入新时代逐渐形成为西方新一轮的“中国谜题论”:新时代中国会走和平发展之路吗?“修昔底德陷阱”能否在中美之间避免?宽阔的大西洋足以容纳中美两国的呼吁是否意味着中国要与美国争夺霸权?已经醒来的中国雄狮会对世界形成何种后果?此等问题层出不穷。“中国谜题论”反映了某些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有意无意对中国形成的误解,这些误解包括以下方面:一是在某些西方国家看来,新时代中国改变了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不打头”的“韬光养晦政策”,正在积极谋求在全球范围内取代美国的领导地位;二是某些西方国家认为,中国正在对外输出政治模式和中国方案,如美国就把“一带一路”建设解读为中国正在进行新的经济殖民主义;三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某些西方国家认为,中国正在改变二战以来形成的国际机制。^[6]从上述几个方面不难看出,西方煞费苦心臆造的“中国谜题论”把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差异有意识地延伸到政治制度、治理模式和所谓“主流价值观”——即西方近代以来所谓的“政治文明”层面。它集中显现了西方主要国家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对蔓延在全球的“西方文明衰败论”的复

杂心态,更集中体现了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高度警觉和主动出击心理。

(二)以“联结和沟通”世界为要旨,构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要义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国际传播话语体系

1. 以全球视野擘画新时代国际传播蓝图

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倡导不同文明交流互鉴、释疑解惑、结交朋友、驳斥谬误,在国际舆论场中发挥意见引导、达致共识的功能。习近平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国际传播事业要“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接中外、沟通世界”^[7]。这一论述画龙点睛地说明了新时代赋予国际传播事业更加丰富的内涵,同时也更加突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国际传播事业的认知更加理性和科学。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高度重视国际传播工作,把国际传播工作作为结交国际朋友、揭露敌对势力的重要手段。围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这个中心,国际传播工作作为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视为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反映了国际传播工作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地位和重要性,从“时”和“势”的角度丰富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交往的思想。

“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接中外、沟通世界”既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国际传播的历史使命,也是营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良好国际舆论环境的重要实践方式。建设新时代国际舆论场和构建中国特色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必须“走出去”,广泛结友,并利用时机、讲究策略,集中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把握世界。这是时代赋予中国国际传播工作必须具备的特质,更是中国观察世界、引导世界必须具备的视野格局。总结以往教训,国际传播工作需要解决好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人云亦云、跟风随从;二是对国际传播对象心理需求认识不足、忽视国际传播规律,不能有效沟通、讲好中国故事;三是不能正确认识国际传播中的资本和技术因素,盲目地把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建立等同于炫平台、花大钱、造声势。鉴于此,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应该积极运用互联网思维推动创新,融合各种媒体资源,有目的地打造旗舰媒体,增强国际传播能力,加快构建国际舆论引导新格局。从西方媒体发展的经验看,打造强大的国际传媒集团,是适应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环境下媒体实现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并逐步走向国际化、集团化、数字化和网络化发展的可行之路。

2. 以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国际传播话语体系构建的目标理念

21世纪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于中国发展而形成的焦躁,以及由此对中国进行的各种传播打压有增无减。但是,中国国际传播的水平 and 实力却明显不能适应时代和国家发展的需要。习近平指出,现在为什么会出现中国在国际上有理说不清的情况,就是因为话语体系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所以要“创新对外宣传方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8]。从媒介技术发展及与之相关的国际舆论格局变化来看,努力构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的国际传播话语体系是适应当前国际舆论斗争的迫切需要。当前,中国正处于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关键时期,但是却缺乏与之相应,且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9]。

确立新的国际传播战略,以新的思维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对于促进对外开放,深入发展和不断扩大国际交往,对于有力驳斥源于部分西方国家和媒体的攻击和抹黑,对于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对于推进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和奋斗目标,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与长远意义。西方国际话语权中的中国形象是一个刻板僵硬的形象。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西方长期以来以意识形态为标签来片面解读中国;另一方面中国自身不能用适当而充分的话语体系展示客观真实的中国形象。近年来,在话语体系总体建设发展方面,中国之所以与自身的发展实践不相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不能对西方的概念和话语体系进行科学判断和分析,导致不是套用西方概念和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发展和实践,就是对西方的概念和理论大加挞伐,没有区别地完全否定。无论是呼吁与国际接轨还是害怕被

西方所攻击,实际上就是无形中仍然把西方的概念和话语体系当作标准和规则。以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述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国际话语体系既要体现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坚定性,体现中国几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特征,也要充分反映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人类整体文明未来发展的大趋势和世界各国人民追求幸福理想生活的合理诉求。

3. 以文明交流互鉴助推新时代中国特色国际传播话语体系构建

基于文明交流互鉴的原则不仅能更好地理解不同国家和人民美好追求的合理性,而且能在实践中推动各个国家和地区为实现各自梦想而展开实质性合作,还能理解各国实现各自梦想的道路选择,有效避免意识形态差异导致的相互间的猜忌、对立和冲突。坚持文明交流互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刻理解不同国家和民族实现梦想的目标和路径的差异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常态:一是可以从根本上把握不同文明形成发展的历史环境及人文技术背景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不同民族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模式,进而理解由此而形成的不同民族文化传统对其当代发展目标和路径选择的影响;二是可以有效促进不同国家和民族在追求实现国富民强的美好理想中求同存异、互帮互谅,最大程度防止和消除大国沙文主义、文明优越论等近代以来,西方文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的文化殖民和渗透;三是能够促使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共同发展过程中正视全人类面临的诸如气候变化、流行性疾病传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以及恐怖主义势力蔓延等对人类整体文明发展所形成的严峻挑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醒不同国家和民族在追求自身“小我”利益的同时,更要从全局的、系统的角度,科学思考全人类整体利益的发展趋势;四是坚持文明交流互鉴原则能够从根本上寻求到为实现各国不同美好梦想而采取共同行动的思维路径、行动方式。

(三)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彰显中国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

1.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彰显中国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突出体现了当代世界发展过程中不容忽视的人本意识、包容意识、合作共赢意识和可持续发展意识,也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共同体思想的创造性丰富和发展,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追求公平、公正、合理、平等、和谐的国际新秩序理念相一致,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将自身发展目标与世界发展方向相统一的全球视野、世界胸怀和大国担当,表明了新时代中国将与不同国家和民族携手并进,为建设全球和平、安全有序、繁荣共享、包容开放、美丽宜居和可持续发展的新世界而不懈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公平、公正、合理为原则改革创新全球治理体系,既体现了坚定维护中国国家 and 民族利益的信心和决心,也顺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希望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作用的期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立足于世界文明和人类社会整体发展,能最大程度反映国际社会利益需求的最大公约数,创新了中国国际传播工作的新思路,拓展了国际传播新局面,有助于向世界提供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道路,有利于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进步伐,也是解决诸多世界难题的一剂良方。

2. 拓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创新新时代中国特色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内涵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当代中国认识世界、把握世界的核心话语和标示性概念,它是新时代中国基于把握人类文明未来走向而贡献的公共性思想产品,体现中国在实现自身的复兴和崛起中,没有忽视人类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并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中国方案。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引领,构建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的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回应外部世界的核心关切,应重点把握和处理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一是如何对外阐明国内社会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协调关系;二是如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前发展现状的价值融合讲清楚;三是如何采取针对性的表达方式回应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利益诉求及核心关切;四是在处理国际关系和履行国际义务以及担当国际责任中如何做到知行合一、言行一致;五是有力回击恶意歪曲事实真相,在国家安全及核心利益问题上对中国进行污名化的行为。正如习近平所说:“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

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10]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设的关键是明确话语体系既要凸显中国道路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适用性、有效性和特殊性,也要强调这种道路选择对其他国家和民族实现发展的普遍启发性意义,显示中国正在超越“修昔底德陷阱”,避免近代以来大国崛起必然导致战争的恶性循环。

3.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导向的国际传播话语共同体凸显了跨文化传播的地位和功能

跨文化传播不仅是对不同文化创造、变迁和分野进程及意义进行阐释和认知,更重要的是对近代以来国际格局和国际关系的发展变迁产生了独特影响,特别是对于消除不同文明间的分歧,避免人类冲突起到了政治、经济因素以外的融合剂功效。透过跨文化传播考察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导向的话语共同体构建提供的启示是:“人类之所以能够不断地将文明提升到更高的阶段,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各民族和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寻求到了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11]正所谓“鞋子合不合脚,只有穿的人自己才知道。”汤因比曾经对21个文明进行比较,从而勾勒出整个人类文明历史的单元基础,以此对人类历史整体进行研究。^[12]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导向的国际传播话语共同体之所以能突出跨文化传播的特殊功能,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作为话语共同体核心语言和言语表达内容能够最大限度聚焦人类公共性价值,从而彰显人类共同利益合法性存在;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内涵在张扬全人类公共利益的同时,并没有贬抑民族国家自身利益个性化诉求的合理性。相反,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导向的话语共同体倡导各民族国家积极找寻适合本国的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发展道路,并在此基础上努力参与人类公共性价值利益的创造和分享中,这就将民族国家发展的个性和全人类公共利益的普遍性有机联结在一起。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引导的话语共同体不是对西方所谓国际自由秩序的挑战,而是在承继中国传统“和合文化”基础上实现人类社会整体价值的最大公约数。正如习近平所说:“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13]

(四) 拓展和创新以传播好中国声音为核心的国际舆论引导新路径

1. 以“两个舆论场”的有机结合促进国际舆论场构建和舆论引导

成功的舆论引导艺术可以提高对受众的吸引力、感召力和说服力,让受众在不改变自己信息接受习惯的前提下更易理解和接受。调整和优化国际传播舆论引导工作的整体布局,根本的一条是始终铭记国家利益至上,将维护国家利益、塑造国家形象作为全部工作的立足点、出发点和根本点;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舆论引导工作应该做到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的有机结合,努力实现两个“舆论场”目标一致,形成共鸣。两个“舆论场”不一致的根源在于某些主管部门在国际舆论引导中对民间舆论场功能的认识不足,低估甚至漠视或排斥社会公众基本的、合理的意见表达,没有做到将政府主张与人民群众呼声在国际传播中进行有机统一。加快构建新型国际舆论场和国际传播舆论引导新格局,必须从新闻传播的“时、度、效”着力,抢抓时机、把握节奏、讲究策略。“时、度、效”三者是辩证统一的整体。时,就是舆论引导的最佳时机,要做到适时而动,不拖沓,同时要正确把握新时代发展脉搏和使命;度,就是要求舆论引导中的分寸和火候;效,要求舆论引导的实效质量,引导受众正确认识事物真相。提升国际传播舆论引导效果必须将舆论监督的法治化问题放在重要位置。法律是实施监督权力的根本保障,是维护舆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知情权、监督权、表达权的锐利武器。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提高国际传播舆论引导力,与加强新闻舆论监督二者之间并行不悖。

2. 加强国际传播能力须做好“内功”和“外功”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后,中国国内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也处在剧烈变化中,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民粹主义势力上升势头明显,中国对外交往和国际传播也面临新形势新挑战。其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部分西方主要国家对中国快速重新崛起提出的

质疑甚至中伤严重影响中国作为文化历史悠久、负责任的大国国际形象。如何扭转这种国际舆论场上的被动局面无疑是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习近平国际传播观的核心主旨要义就是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构建融通中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从根本上讲,既要做好“内功”,也要做好“外功”。所谓“内功”就是要有硬件基础设施的支持,比如对信息技术的把握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适应信息技术发展水平的传播组织机构和手段,以及与此相应的、熟悉国际舆论场生成变化的专业人员;所谓做好“外功”就是主动深入传播对象之中,了解传播对象所思、所想、所为和所需,这就要求既熟悉传播对象的历史文化传统,又要准确把握传播对象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世界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的总的意见和态度,以及与他们相关的利益诉求。

(五)以悠久的文明史为切入口,深刻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必然联系

1. 对外阐释好当代中国道路选择、理论选择和制度选择离不开“和合”文化滋养

传统儒家文化中,“和”是人文精神的核心。《论语·学而》中的“礼之用,和为贵”反映了孔子无论治国理政还是尚循礼乐制度都必须以“和”为价值标准的思想。孔子特别强调“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14]。“和”不仅是儒家思想中的核心概念,而且道家的老子也明确指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15]。“道”意味着任何事物都是由阴阳两个互为相反的方面构成,而正是阴阳的作用形成“和”,“和”就是宇宙万物的本质。《管子》直接将“和合”并举,指出:“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16]《易传》提出“保合太和,乃利贞”^[17],这表明重视合与和的价值、保持完满的和谐,万物就能顺利发展。由此可见,“和合”文化传统在中国由来已久。但是,“和合”文化并非抹杀事物本身的差异和矛盾。相反,“和合”文化在承认差异和矛盾的基础上把各种不同的事物统一于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中,由此使处于整体中的不同事物相互取长补短、互为补充,从而促进新事物的产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理论选择和制度选择突出反映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质,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上有效传播出去不仅能够让世界其他国家和人民更好地了解中华悠久的历史传统,更能使他们正确认知当代中国的发展目标和与之相关的路径选择,以及这种发展目标和路径选择与人类整体文明发展之间相互促进、互为补充的关系。

2.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的深厚哲学底蕴反映了当代中国和平崛起之路的历史和现实必然性

中国共产党在一百多年发展中虽然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和政策在不同时代不尽相同,个别时期甚至以去除糟粕的名义将传统文化作为斗争的工具,但“取之精华、弃之糟粕”的政策内核基本上一直居于主导地位。被认为中国现存最早史书的《尚书》首篇《尧典》提出过“协和万邦”^[18]的思想。按照朱熹弟子蔡沈的理解“万邦,天下诸侯之国也”^[19]。朱熹则对“万国咸宁”直接注解为:“万国各得其所而咸宁,尤万物之各正性命而保合太和也。”^[20]不仅如此,《礼记·礼运》中更是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21]它凸显了中国古人对理想社会制度、经济制度、人际关系和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价值目标追求,特别是“讲信修睦”更体现出中国古人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和国家以及国家之间和谐相处之道就在于“诚信”,以诚信作为社会和谐、万邦安宁、化解分歧和误读误判的基础。近代以降,孙中山、康有为“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等思想的广泛传播,使得中国自古以来的大同世界价值理想不断得到增益和补充,从理论渊源上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了富有价值的当代启发。这对于在国际传播实践中更好地阐述当代中国和平崛起的意志和实现方式不是对国际社会虚与委蛇的权宜之计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因为中华传统文化历来讲究以德治国、以文化人,这与近代以来西方某些国家奉行的武力夺利理念和行为形成了鲜明对比。

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的肥沃土壤

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生根、发芽、不断成长壮大和不断丰富完善的肥沃土壤,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必须与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风俗文化和具体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其对于改造社会的科学指导意义才能充分体现出来。二是观察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实际离不开对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及其传统文化的考察。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只有历史的、民族的东西才能反映一个国家为何现在是这个国家而不是别的国家。同样,中国的现实情况也是从历史中走出来,不断累积经验和智慧、铭记教训的过程,其中最能体现这种经验智慧的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所形成的民族文化。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礼仪之邦以及“为政以德”“义以为上”的治国安邦之道,并将此作为个人、社会和国家发展是否“向上向善”的标准。孔子曾经说过:“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4]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示了其特有的包容、开放、和谐、与时俱进的品质,正是这些品质使它具备了与其他外来优秀思想文化相互交融、互为补充的资质,既形塑了中国的整体形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行动准则。也正是因为这些品质,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优秀思想才有了在中国的立足之地,才能在中国落地生根发芽、不断成长。

(六) 从执政理念和政策主张全方位多角度呈现中国共产党执政成就

1. 利用媒体对外展现中国共产党以民为本、执政为民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从执政理念和政策主张角度创新党的国际传播工作,全面展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成就,从而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深度了解、尊重和认同是习近平关于国际传播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媒体肩负着对外讲清楚、说明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怎样“能”成为中国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并带领中国人克服艰难险阻取得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习近平特别要求不仅要改革开放40多年的成就进行充分传播,同时还要重视改革开放前30年所取得的重大成就。^[22]如何回应国内外关于如何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前30年与改革开放40多年之间的关系问题成为当代中国国际传播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是辩证的统一,二者相辅相成,没有改革开放前的基础准备,就不能有改革开放后的继承和发展。^[22]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建设探索虽然遭遇很多挫折或是重大失误,但也取得了重大成绩,而且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在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内忧外患的情况下,通过自力更生实现的;改革开放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经济及社会发展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也累积了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如果因为改革开放前的重大挫折而否定所取得的成绩,或是因为改革开放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回避存在的问题,都是错误的,都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态度。

2. 在国际上传播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国方略

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绝非是对旧概念的新表述,而是结合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发生历史性飞跃的重要现实做出的科学论断,具有丰富的思想、实践和历史内涵。从词源学和时间量向度讲,时代一般指两个时间节点之间时间量的累积。也即是说,时代不是某一个单独的时间点,而是指某一段经过一定量积累的时间。马克思曾经指出:“正如线不是空间的点一样,时代不是时间上的时刻。”^[23]从时代蕴含的思想、内容和历史内涵来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走过了极为不平凡的10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历时性成就: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迈出了重大步伐;人民生活水平不仅得到了不断改善,而且生活质量也在不断提高;全面从严治党成效显著,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压倒性阶段性胜利。这些变化势必引发某些西方强国的警惕和忧虑。不可否认,还有其他一些国家对于迅速崛起的中国未来发展战略和目标也不甚清晰。这就需要新时代国际传播工作必须改变以往以意识形态为主要内容的宣传为主导的思

维模式,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将客观沟通、深入交流、增进了解作为主要目标,尽最大可能对国际社会解疑释惑,进而向世界传播中国的主张、弘扬中国的价值、讲好中国的故事,以获得国际社会更多理解和支持。

3. 通过政党外交及其他形式全方位宣介和传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辉煌成就

建立新型政党关系不是搞“小圈子”,而是为了在平等对话基础上,相互之间建立起密切的伙伴关系,通过磋商合作,寻求世界共同面临的问题的解决之道,这是建立新型政党关系的根本出发点和立足点。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明确指出:“国际上一切和平力量都是我们的朋友,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我们也不搞集团政治,不依附任何集团。这一政策对于维护和平比较有利。”^[24]习近平强调:“要对外介绍好我国的内外方针政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把中国梦同周边各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同地区发展前景对接起来……”^[25]通过与不同国家建立新型政党关系,可以更加深入地让国外政党了解中国共产党如何践行“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及执政为民的理念。通过政党外交与各国执政党、参政党、在野党培植长久友好的政党关系,从而加强与政党政治家、精英人士的对话交流,对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政党阐述中国政治经济制度、和谐社会建设和对外政策主张以及维护世界和平、反对强权、永不称霸的坚定信心,并通过各种不同途径和渠道释疑外部对中国发展战略的关切,对中国梦、和谐世界的内涵及本质进行精准传播,揭露和驳斥对中国的无端指责和抹黑。

三、习近平国际传播观的时代特征

习近平国际传播观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和观点,精准把握时代发展脉搏,科学回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不同文明何以兼容的时代之问。既有对人类数千年文明历史演进的比对,又将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置于人类文明发展整体进行考量,重点不仅在于对外充分展示当代中国价值所具有的突出竞争优势和巨大发展潜力,更向世界表明中国价值理念及实践对促进人类整体文明变迁所具有的全球视野,体现出了传承与创新、作为与开放、包容与自信、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

(一) 历史传承与时代创新是习近平国际传播观的鲜明特征

创新是一个民族永葆旺盛生命力的不竭之源,也是人类文明薪火相传、不断推陈出新的动力之基。习近平国际传播观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世界交往和人类不同文明交流思想的继承和借鉴,也是在技术和社会历史不断发展的条件下的开拓与创新。习近平指出:“文明永续发展,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顺时应势、推陈出新。世界文明历史揭示了一个规律:任何文明都要与时偕行,不断吸纳时代精华。”^[26]正是基于文明交流互鉴需要不断开拓创新的理念,习近平在国际传播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为引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并以“一带一路”倡议实践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依存共生的辩证法思想^[26]。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事物内部各要素和事物之间都存在着普遍联系;任何事物之间以及事物的矛盾对立面之间都既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又相互独立、互为作用。中国哲学主张万事万物和谐共生,强调事物多样性存在是世界充满生机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正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精华和中国先哲思想之精髓的深刻领会,习近平在国际传播中提出了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确保世界和平发展的中国方案。“要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营造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27]也正是在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统一体的思想指导下,以“中国梦”为引领,构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中国特色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在韬光养晦前提下有所为有所不为,推动世界治理体系与和平发展机制在新的技术和人文背景下进行有利于促进人类文明整体发展的历史性变革,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创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国际传播。这种创新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民族风格,同时也显现了宽广的世界视野和胸怀天下的情怀;这种创

新既继承丰富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交往的思想,也开创并拓展了新时代社会主义国家国际传播理论的新领域。

(二) 主动作为与开放互动是习近平国际传播观时代特征的又一重要体现

新中国的成立开启了中国国际交往的新纪元,但由于受制于当时西方反华势力对新生人民共和国的围堵,20世纪50年代至中国改革开放前中国对外交往基本上局限于将政党交往与国家交往合为一体的格局,其主要特点就是不计国家利益维持以政党关系为核心的国家关系,尽管民间外交一直未有间断,但基本上处于不公开状态。改革开放后,为了营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不打头”的对外交往原则。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中国越来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与外界交往以及承担的国际责任也越来越多,交往对象和处理事务越来越复杂,这就使得新时代中国面临的国际传播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具挑战性。以什么样的心态和何种理念在国际交往中既能突出中国数千年来的优秀文化传统,又能顺应时代发展大势,及时吐故纳新展现新时代中国重新崛起的精神状态和秉持的基本原则,成为习近平国际传播观回答的重大时代课题。纵观习近平有关国际传播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讲话和国际交往实践,具体呈现为国际传播理念和国际传播方式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体现在习近平在国际交往活动中主动设置中国议题,巧妙反驳某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污蔑和攻击之词,如“中国威胁论”“中国搭便车论”“中国崩溃论”“中国渗透论”“中国谜题论”等各种曲解和污名中国的现象。习近平国际传播观的开放性还体现在交往对象的多元化,这种多元化不以意识形态为界,在与各个国家政府组织、国际组织开展多种交往的基础上,积极拓展与持不同意识形态立场的政党、组织等进行不同形式的交流,通过交流双方可以各抒己见,在此基础上求同存异,寻找合作共识和基准点,增进双方相互了解和认知。

(三) 包容自信是习近平国际传播观时代特征的突出呈现

包容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特征,也是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历经磨难仍立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根基。习近平国际传播观充满了高度的民族自信和对多元文化的包容,充分体现正在重新崛起的、具有5000年厚重文明历史的东方大国对世界各国人民追求幸福理想生活的尊重,以及当代中国价值观对促进人类整体文明不断向更高层次迈进的民族自信心。其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是这种包容自信的有力证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既体现中国追求和平发展的愿望,体现为国际社会提供具有中国智慧、中国思考的事关人类发展未来的“中国方略”的民族自信,也包含了对人类文明多样化发展的包容。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历来重视人类文明发展进化中的多样性。马克思在考察自古希腊、罗马以来的西方文明进化史时曾经以“生产方式的多样性”进行历史阶段划分,提出了“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28]即使在西方,不同民族、不同地区进入某种历史阶段的具体时间也各不相同,它们所走的道路、表现方式也各不一样。中国一贯强调,中国的重新崛起绝不会改变现有西方大国的既得利益,也不会挑战现有国际秩序。这充分表明,一个正在实现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中国有足够宽广的心胸和充满智慧的自信心面对当今世界多元化的发展。中国自古以来追求“世界大同”“和而不同”“求同存异”,这种传统已经深深地浸透在中国人的血脉里,它表明了中国文化的包容与自信。历史学家汤因比在预测未来世界和平场景时曾经不加掩饰地说道:“我所遇见的和平统一,一定是以地理和文化主轴为中心,不断结晶扩大起来的……并且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29]作为历史学家的汤因比能够对中国文化的包容性理解如此深刻不能不让人深思。

(四) 与时俱进是习近平国际传播观时代特征的根本体现

习近平关于国际传播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讲话、谈话和对外交往实践充分体现了对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理论的继承发展和不断创新,具有与时俱进的鲜明时代特征。这种与时俱进体现出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机结合。习近平国际传播观与时俱进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中国成功经验和外来先进文化因子有机地辩证统一起来。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主要任务就在于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阐释中国道路从何而来、又将走向何处,这就需要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与当代经验两个方面讲清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如何发生变迁,以及这种变迁反映了一种怎样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对外清晰阐明“以人为本”以及党的意志与人民意志之间的关系。习近平强调对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就是要与时俱进地,从历史和现实的维度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的必然性以及当代中国如何汲取历史优秀传统,以富有远见的思维看待文明发展进程中个人权利与集体利益,甚至人类整体文明之间的关系,而非像近代以来西方某些单纯片面地强调社会发展中抽象的人权概念,从而为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观察、认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方略、实施手段、目标任务和未来走向,以及与此相关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一带一路”建设实质提供参照。新时代向世界传播中国核心价值观必须与时俱进地讲清楚中国传统意义上个人权利与责任的关系,这对于让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了解中国共产党为何能领导人民实现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88;166;804;180.
- [2] 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林华,杨韵琴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294-296.
- [3] 齐格姆·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份子.洪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34.
- [4] 亨利·基辛格.论中国.胡利平,林华,杨韵琴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422.
- [5] 闫亮.寻找破解新时代“中国谜题论”的钥匙.对外传播,2018,6:13-14.
- [6] 王俊生.如何化解外界“中国谜题论”.对外传播,2018,6:15-17.
- [7] 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习近平总书记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辅助材料.北京:学习出版社,2016:6.
-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107.
- [9]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5.
- [10]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1.
- [11] 周宇豪.以文明交流互鉴助推对外话语传播.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06-06.
- [12] 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郭小凌,杜庭广,吕厚量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284.
- [13] 习近平谈世界遗产.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9-06-06. [2022-03-11]. <http://cpc.people.com.cn/n1/2019/0606/c64094-31123868.html>.
- [14] 孔子.论语.张燕婴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8;13.
- [15] 高亨.老子注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74.
- [16] 墨樱.管子启示录.北京:京华出版社,2009:188.
- [17] 王锦民.周易新注(上).北京:中华书局,2012:8.
- [18] 尚书.慕平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2.
- [19] 蔡沈.新刊四书五经书经集传.北京:中国书店,1994:15.
- [20] 朱熹.周易本义//朱子全书(第1册).朱傑人,严佐之,刘永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90.
- [21] 戴圣.礼记.北京: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63.
- [22] 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4;6.
- [2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6.
- [24] 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044.

- [25] 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周边环境.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3-10-26. [2022-05-01] [http://cpc. people. com. cn/n/2013/1026/c64094-23333683. html](http://cpc.people.com.cn/n/2013/1026/c64094-23333683.html).
- [26] 习近平. 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470;476.
- [27] 习近平. 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8.
- [28]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3.
- [29] 汤因比, 池田大作. 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 旬春生, 朱继征, 陈国梁译.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5:294-295.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Core Content and Times Characteristics of Xi Jinping's Ideology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Zhou Yuhao, Liu Ning (Shanghai University)

Abstract: Marx and Engels' thoughts on world communication provide a unique thinking field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of socialist countries. Guided by Marxist classical writers' thoughts on world communication, Xi Jinping takes the concept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s the core of his thoughts, with the main goal of telling a good Chinese story, spreading a good Chinese voice, enhancing China's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and building an international media group with strong communication power and influence, based 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at the key point of the world's unprecedented changes 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dream of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places the interaction and communication among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civilizations as well as the forms of interac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broad scope of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as a whole, which has built a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deology with distinctive features and a complete ideological system.

Key words: Xi Jinping; view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discourse system

■收稿日期:2022-05-16

■作者单位:周宇豪,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上海 200444

刘 宁,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肖劲草